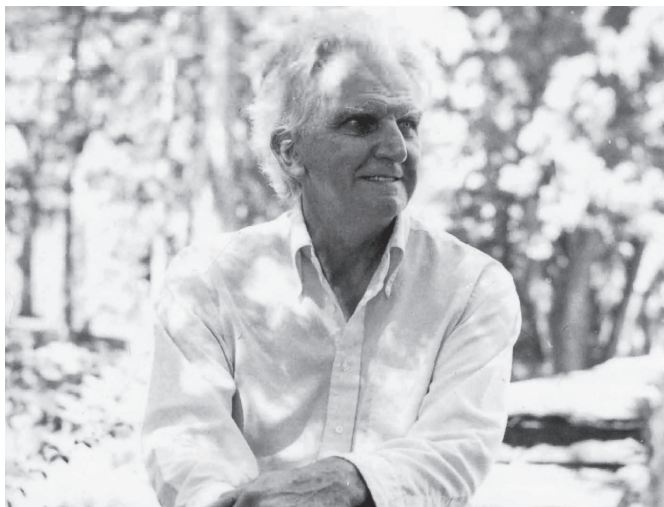


# 肯尼斯·鲍尔丁

Kenneth E. Boulding

■文 / 黄晶 仲平 刘家琰



肯尼斯·鲍尔丁，《肯尼斯·鲍尔丁：荒野中的哭喊》（罗伯特·斯科特）

肯尼斯·尤尔特·鲍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学”概念使他在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被广泛熟知，他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刻洞察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特征。《纽约时报》称他为“备受尊敬但非传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谢伦伯格称他是位不受界限束缚的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制度经济学家麦瑟尔·奥尔森称他为“一半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半圣雄甘地。”

## 一、早期教育背景和经历

1909年，鲍尔丁出生在英国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位燃气工人，兼任当地循道宗非神职布道者，母亲也是虔诚的循道宗教徒，热爱读书和诗作，这也培养了鲍尔丁从小喜爱读书和写诗的兴趣。

“一战”对鲍尔丁有着深远影响。尽管父亲因身体原因没有从军，利物浦也并未遭受炮火袭击，但他在自传里提及，清晰记得服兵役的叔叔满身虱子从战壕中归来时脸上的表情、儿时犹太好友的哥哥牺牲后他的母亲痛不欲生的样子，差不多从那时开始，鲍尔丁开始有了口吃的毛病。

1928年，鲍尔丁获得牛津大学新学院化学奖学金。一年后，他对枯燥的实验室工作失去兴趣，转向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方向。经济大萧条逐渐在英国蔓延，鲍尔丁感受到了脆弱经济对社会和家庭的普遍影响，在他看来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于是将其作为兴趣与研究重点。特别是在阅读了约翰·凯恩斯的《货币论》后，鲍尔丁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

1931年，鲍尔丁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经济学学位并继续就读研究生，期间他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理论中‘替代成本’概念的地位”并请凯恩斯指教。凯恩斯时任《经济学杂志》编辑，他对鲍尔丁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最终同意发表，这对鲍尔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 二、始于经济学领域

1932年，鲍尔丁在英联邦奖学金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在去程的客轮上，他结识了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两人讨论了他的论

文,对许多经济学问题产生共鸣。进入芝加哥大学后,他师从弗兰克·奈特和亨利·舒尔茨。当时经济大萧条已经肆虐,但鲍尔丁发现大学里似乎与世隔绝,人们生活几乎不受影响,也很少有人研究这一问题,这引发了他更深的思考。1933年,应熊彼特邀请,鲍尔丁来到哈佛大学学习,但不久就患上气胸并住院。康复后,他回到芝加哥度过了研究生学业的最后6个月。

1934年,奖学金结束后鲍尔丁回到英国,此时他已积蓄告罄且无家可归,幸而成功应聘了爱丁堡大学经济学助理讲师的工作。与芝加哥大学相比,鲍尔丁对这里沉闷的学术氛围感到失望,但通过与教授威廉·巴克斯特学习资产平衡表等会计学理论,改变了他对企业和资本的看法,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着重要影响。1935年,弗兰克·奈特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再谈投资理论:鲍尔丁与奥地利学派”,就鲍尔丁早期论文进行评述,使他在该领域“名声大噪”。1936年,鲍尔丁抨击学术氛围的演讲被《苏格兰人报》以文章刊登出来,使他在同事间更加不受欢迎。

1937年鲍尔丁合约期满后未得到续聘,经朋友介绍,应聘为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教授并开始在美国定居。他利用两个暑假完成了《经济分析》,该书被认为实现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统一,后来成为美国甚至全球高校经济学核心教科书,曾多次再版,这奠定了鲍尔丁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的暴行、英国对德国的宣战等事件引发了鲍尔丁愈加低沉焦虑的心情和对德国人的仇恨,甚至一度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只能通过写诗缓解情绪。1941年一次贵格会礼拜上,鲍尔丁与伊丽丝·比昂·汉森一见钟情,两人在18天内订婚、3个月内完婚,一直维持着美满的姻缘,先后育有5个孩子。在妻子的帮助和鼓励下,鲍尔丁重新坚定了和平主义信念,试图通过对上帝纯洁的爱抵消对敌人的恨,这也是他对人性始终乐观的体现。

婚后鲍尔丁和妻子搬到普林斯顿,1941年开始在国际联盟经济事务部门工作,开展“一战”前后欧洲农业发展情况研究。1942年秋,鲍尔丁来到田纳西州费斯克大学任教,以战后重建为主要内容撰写了《和平经济学》(1945),提出了“浴缸原理”,阐述了对战后经济复苏及避免战争的看法。期间,来到菲克斯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激发了鲍尔丁对社会生态学和进化理论的研究兴趣。一年后,鲍尔丁应邀

前往爱荷华州立学院教授和研究劳动经济学,他认识到研究劳工运动等现实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学,还需具备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甚至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在鲍尔丁看来,各社会学科均在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社会制度,经济学构成社会科学的骨架,其他学科作为肌肉和血液充实了社会研究体系,他由此萌生了统一社会科学的想法,并逐渐远离了传统经济学的主流研究。

### 三、转向社会科学研究

1948年,鲍尔丁正式加入美国国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逐渐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学,仅有益于解决经济学问题的社会科学。他于1948年开始撰写《经济学重建》(1950),这是他对“经济学理论被接受和传授现状日益不满的产物,以及建立比当前学说体系更有用的理论模式的一次尝试”。他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类比,将系统失衡或达到新平衡前的短暂平衡状态称为内稳态或生态平衡。美国科学促进会百年盛典活动上,鲍尔丁以“经济学是必要的吗?”为题发表演讲,指出生态系统中群体规模和种群内迁徙流动受其他种群影响,社会系统同样如此。

1949年,鲍尔丁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同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尽管他此时的研究兴趣已超出传统经济学范畴。他开设了促进社会科学整合的课程,思路逐渐扩大并覆盖了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鲍尔丁与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结识,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一般系统论以系统为对象,分析系统整体和各组成要素间的关系,形成了研究系统问题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1954-1955年,鲍尔丁受邀到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访学,同行的还有贝塔朗菲及同样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数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物理学家拉尔夫·杰拉德、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等。几人联合创建了一般系统研究学会(后更名为国际系统科学学会),鲍尔丁于1957-1958年担任第一任主席。他大力支持系统论的跨学科方法,主张通过学科协同融合发展,避免重复工作,提高效率并促进知识扩展。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跨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但缺乏成体系的理论知识。鲍尔丁等人获知了路易斯·理查森利用历史数据和天气预报模型分析战争起

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较强系统性和严谨性,计划通过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成果,促进跨学科研究和交流,《冲突解决》期刊因此设立。该期刊第一期于1957年3月发行,供稿作者托马斯·谢林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在《冲突的战略》(1960)一书序言中称鲍尔丁是对他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期刊编辑部设在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了国际和平科学学会官方期刊。1959年鲍尔丁等在密歇根大学建立冲突解决研究中心,鲍尔丁在1961-1966年担任主任。

期间,鲍尔丁还撰写了《映像:生命和社会认知》(1956),提出行为主要受人们对外部环境解读和认识(书中称为映像)的影响,而非行为主义所认为的外部刺激。他不否认外部刺激的重要性,但外部刺激相同时,个体因经历等因素不同,经过价值体系的过滤加工,会产生不同映像,并进一步影响其未来发展。该书被认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认知主义的发展,也是鲍尔丁阐释人类知识整体性的尝试和贡献。

1959-1960年,鲍尔丁来到西印度群岛大学牙买加校区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写下《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一书,试图使经济学在和平与冲突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他提出伴随科技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国际冲突加剧是必然,但冲突不等同于战争,也可带来建设性结果,深思远虑的做法是将焦点转移到更远的目标上,通过合作获得共赢。

1962年,鲍尔丁和妻子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会,同年他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选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3-1964年,鲍尔丁来到位于日本三鹰市的国际基督教大学访学。截然不同的亚洲文化使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理论产生兴趣。鲍尔丁与学生深入讨论人类历史辩证问题,相关讲座内容被整合成《社会动力学入门:历史的辩证和发展》(1970)一书,随后发展形成《生态动力学》(1978)。鲍尔丁提出宇宙大爆炸诞生了地球物理系统,随着生命演化出现了生物系统,并最终发展出社会系统。他认为如同生物系统中的基因突变与物种选择,社会系统也在不断进化并受人类驱动,科学知识是现代世界进步的主要因素,他在《20世纪的意义》(1964)中指出科技驱动下人类社会正经历从文明社会到后文明社会的过渡。

从日本返程途中,鲍尔丁完成了《经济分析》第四版修订,并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暑期班讲课,为后来任职结下了渊源。

#### 四、奠基现代生态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平原发生的严重沙尘暴没能引发人们对资源开发和经济模式的严肃思考;4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聚焦美国经济发展,组建专委会对美国未来25年食物和原材料供给的充足性进行评估;50年代美国消费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盛行,无人质疑经济增长的模式,只是担心其可持续性;60年代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对生态破坏的强烈谴责引起社会反响,但未触及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根源;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我们的合成环境》对美国社会经济体系破坏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原因进行阐述,却未得到广泛关注,也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表达对环境的担忧。

在此背景下,鲍尔丁关于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观点尤为珍贵。1965年5月华盛顿州立大学举办的空间科学委员会会议上,鲍尔丁发表了题为“地球是一艘宇宙飞船”的演讲,并在1966年3月第六届未来资源论坛上,发表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他对比了过去看似拥有无限资源的开放经济与未来封闭经济,“我把开放经济称为‘牛仔经济’,牛仔是无垠平原的象征,也与鲁莽、剥削、浪漫和暴力行为相连。类似地,将封闭经济称为‘宇航员经济’,地球是一艘孤独航行的宇宙飞船,无法无限存储资源和废弃物,因此人类必须在循环的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视能量的输入问题,使系统能够持续实现物质再生产。”他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阐释经济学问题,化石燃料消耗导致系统内物质分散、退化或无序,为保障系统稳定须由太阳能、核聚变等新能源提供持续输入,这就需要更多先进技术维持物质稳定循环和流动。

鲍尔丁否定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同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水平是对生产力提高的定量评估,经济发展水平是对生活水平提升的定性评估,经济增长提速不意味着生活水平改善,快速且不可控的经济增长会导致贫富差距变大和环境恶化,发展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且不可持续。人类必须重视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若忽视系统输入输出间的平衡,将导致系统不稳定甚至带来灭亡。他强调消费主义的局限性,指出用来满足后代基本需求的资源正被用于满足当代人的奢侈欲望。鲍尔丁同样反对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割裂,并认为自然更加崇高,他认为二者

共同构成了进化系统整体,社会进化基于并超越生物进化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球面貌,因此需要引导进化,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是他少有的反思环境问题的文章,他也未在该领域继续探索,但赫尔曼·戴利等充分肯定了该文对现代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奠基作用,许多学者认为“地球宇宙飞船”概念的提出对20世纪60和70年代开创并塑造可持续发展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1990年,鲍尔丁出席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大会时在演讲中提出,为解决环境退化、人口增长、化石燃料枯竭等问题,需要借助法制、忠诚、尊重、情感、爱和真理的综合力量,“基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脆弱星球上的认知,我们对它有着共同的忠诚和感情。”由此可见,尽管鲍尔丁没有再致力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但他对生态环境问题长期关注,并敏锐地看到在政治上采取实质行动的必要性。今天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鲍尔丁的见解仍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为纪念鲍尔丁对生态学的开拓性贡献,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每两年颁发鲍尔丁纪念奖,以表彰同样具有生态经济学开创性思想和跨学科研究精神的学者,赫尔曼·戴利(1994)、罗伯特·科斯坦扎(1998)、威廉·里斯(2012)等著名学者都曾是获奖者。

## 五、兴趣广泛和成果丰硕的一生

1967年,鲍尔丁来到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就职,继续开展冲突与和平、进化经济学的研究,并开始探索授给经济学,发表了题为《授给经济》(1969)的论文,并出版了《爱与怕的经济学——授给经济学序言》(1973),试图通过授给行为,即单向的经济商品流动形式,探究经济活动的本质。

1968年,鲍尔丁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1980年从科罗拉多大学退休。之后,他前往达特茅斯学院等多个高校和机构教学和研究,内容从现状转向未来,他的一般系统论思想继续沿着进化理论方向发展,先后出版了《进化经济学》(1981)和《作为整个系统的世界》(1985)。1992年10月,鲍尔丁被诊断出癌症,

并于1993年3月18日去世。

鲍尔丁的一生对经济学的研究贯穿始终,但又远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不拘本本和教条主义,不断挑战传统和权威。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边际生产理论持否定态度,将自己宗教信仰中关于道德伦理的思考融入研究中,视自己为关注人类福祉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他是最早将定量模型用于



肯尼斯·鲍尔丁(中间靠左)1956年在人类对地球面貌改变的作用研讨会

解决冲突与和平问题的学者之一,认为识别冲突和公平快速解决冲突至关重要,关于全球合作的研究在全球化和科技快速进步背景下意义更加重大。他提出“地球宇宙飞船”概念,是第一个将热力学定律等融入经济学思维的学者,尽管在当时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却成为了赫尔曼·戴利发展稳态经济学、罗伯特·科斯坦扎建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并由此推动了现代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曾评价鲍尔丁:“他离开了经济学,却成为一位哲学家。”

鲍尔丁不仅博览群书,而且笔耕不辍,一生共出版30多本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文章,被超过30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获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和平问题研究等众多奖项。他曾担任多个国家或地区学术团体主席,并于1975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也是美国医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2]

作者单位: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